

袁梅 译注

屈原宋玉

辞赋译注

齐鲁书社

屈原宋玉

辞赋译注

袁梅
译注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宋玉辞赋译注 / 袁梅译注.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5

ISBN 978-7-5333-1935-9

I. 屈... II. 袁... III. 赋—作品集—中国—战国时代 IV. I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7511 号

屈原宋玉辞赋译注

袁梅 译注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32

印 张 18

插 页 3

字 数 452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935-9

定价: 42.00 元

序

庄维石

袁梅同志著《屈原赋译注》成，他和齐鲁书社的同志让我写一篇序。我想：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大诗人。他大名鼎鼎，为古人和今人所称道，为我国人和外国人所称道。对于他的生平、思想和作品，近人著作如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何其芳的《屈原和他的作品》，都有较全面的论述，袁梅同志的这本书，也有较全面的论述。这样，我在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经过反复筹思，我只说一说我阅读屈原作品后的一点儿感想吧。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结合《史记·屈原列传》来阅读屈原作品，我认识到：

一、屈原首先是个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并能“守死善道”的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

在屈原的时代，列国之中，秦楚最强：秦据关中之固，一出关门，亦有居高临下之势；楚疆域辽阔，物产富足；两国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究竟谁统一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好坏。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废除了贵族领主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缓和了阶级矛盾，物产日增，国势日强。而楚自吴起变法失败后，政权操于旧贵族之手，剥削残酷，政治腐败，加深了阶级矛盾。^①屈原看到这种情形，认为变法图强是楚国的急务。所以他

在二十余岁做楚怀王的左徒、得到楚怀王的信任的时候,就锐意变法。在屈原的时代,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联合齐国以抵抗秦国应该是楚国的正确的外交政策。特别在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秦惠文王后元七年)楚、魏、韩、赵、燕五国联合攻秦失败后,秦国开始加紧侵略楚国;在公元前316年(楚怀王十三年、秦惠文王后元九年)秦遣张仪、司马错吞灭巴、蜀之后,秦国在军事上给楚国以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联合齐国以抵抗秦国,对楚国来说就更为必要了。因此,屈原坚持联齐抗秦的外交政策是很有眼光的。司马徽说:“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像屈原这样的人,可说是“识时务者”了。有人说:“当中国走向统一的时代,秦将统一,而屈原抗秦,这是拒绝统一,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进程的。”这话说得很好笑。应该弄清楚:问题不是统一和反统一的问题,而是由谁来统一的问题。屈原是楚国人,是楚国的世臣,是楚国的爱国志士,自应要求楚国来统一,而要求楚国来统一,自然要抗秦了,此其一。其次,楚国和秦国原来都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但到春秋时代,中原的思想和文化渐为楚国所吸收:楚庄王曾对潘党谈到《周颂·时迈》(见《左传·宣公十二年》),屈原曾对楚庄王谈到《周书·康诰》(见《左传·成公二年》),蒯聩曾在晋平公的宴会中朗诵《大雅·既醉》(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孔子西行不到秦”,但他到过楚国,受到楚王的重视(虽然因为他是外来人没有得到重任),都可说明这一点。自从公元前473年吴为越所灭之后,楚国势力逐渐向北伸展:公元前431年,楚简王灭了莒国,鲁国渐为楚所控制(到屈原死后不久,鲁卒为楚所灭)。齐威、宣之时,竟筑长城以拒楚。这样,齐鲁文化就易为楚人所吸收。陈良被孟子称为“豪杰之士”,曾经“北学于中国”。屈原也曾到过齐国。他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

以窘步!”(《离骚》)“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先秦诸子中,道、法两家都不重视尧舜,庄子、韩非子甚至认为关于尧舜的传说是后人伪造的。重视尧舜的,莫过于儒家,而屈原对于尧舜如此推崇,可见他受到了齐鲁思想的影响。由于楚国能够吸收先进的思想文化,它的思想文化就有了提高。秦国则不然,它专讲霸道,不重文化,所以它虽变法致强,而当时各国却称它为“虎狼之国”,屈原也是这样称它的。^②因此我们说屈原的抗秦是拯救文化的斗争,也无不可。从屈原坚持变法,坚持联齐抗秦看,他是个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人,是毫无疑问的了。屈原要变法,必然遭受旧贵族的阻挠和破坏,因为变法将削减他们的权益。所以屈原做左徒时造为宪令,草稿尚未写定,上官大夫就想抢走,没有达到目的,就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这般人,于是疏远了屈原,不让屈原继续做左徒,而给他一个闲散的差事——三闾大夫,叫他去管教楚国公族屈、昭、景三氏的子弟去了。屈原变法的意图就失败了。屈原要联齐抗秦,也必然遭受到旧贵族的破坏和反对。因为旧贵族们惯于以私害公,又养尊处优,只需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冒着风险与秦国对抗。所以上官大夫、靳尚、楚怀王幼子子兰、楚怀王宠姬郑袖都要走亲秦投降的路线。楚怀王是个昏庸的国君,根本没有一定的外交政策,经过上官大夫等人的包围,他就依违于抗秦、亲秦两种主张之间。到了楚顷襄王时,子兰做了令尹,亲秦投降派的势力更大了,因而屈原抗秦的外交政策也失败了。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在抗秦与亲秦的斗争中,屈原都失败了,他先后被流放于汉北、江南。倘若他“变心从俗”,向对方妥协,是可以改变他的命运的,但是他坚决不这样做。在屈原的时代,一个有特长的人如果在本国失意,是可以到别国去找出路的。屈原虽

是楚国世臣,但被放逐,也可以到别国去找出路,^③而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坚决不肯这样做。既不能“变心从俗”,又不肯到别的国家去,他只好留在国内被放逐的地方,“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他受到了长时间的折磨。忧愤郁结,何以排遣?于是发为诗歌。直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兵攻下郢都,烧了楚国王陵,取了洞庭五渚江南,楚国君臣逃到陈城(今河南淮阳)去,他认为楚国没有前途了,于是投汨罗江自杀了。“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可谓“守死善道”的人了。屈原要变法,限制贵族特权,减轻人民负担,自系人民的愿望;屈原要抗秦,根据古籍记载,更符合人民的要求。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三点根据:第一,“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史记·楚世家》)。第二,白起攻下郢都,不乘势灭楚,反而退兵,这是因为“白起所击溃的是楚国的正规军队”,而当时到处蜂起的民间武力却与白起为难。^④《史记·六国年表》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说这一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可见白起攻下郢都两年之后,楚顷襄王就利用人民反秦的力量,收集残兵,收复了一些失地。第三,楚“为秦所灭,百姓哀之,为之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风俗通义·皇霸篇》)从这三点根据看,屈原要抗秦,虽为旧贵族、亲秦投降派所反对,却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的。屈原在白起攻下郢都之后,就认为楚国没有前途了,这是因为他只把希望寄托在国王、统治阶级的身上,没有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这是他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但我们对古代作家及其作品,不能要求其超越这种局限,而应当汲取其好的东西,有益于今的东西,例如屈原

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并能“守死善道”,决不向腐朽势力妥协,不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的吗?

二、屈原的作品,是紧密结合他的身世、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作品。

屈原的作品紧密地结合着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环境,这一点在《离骚》和《九章》里的屈作^⑤中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只摘录其中的一些句子来看看: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
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

所谓“美政”显系指变法而言。后人所作的《惜往日》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正可为“美政”的注脚。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
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

这正是屈原热爱祖国、坚决斗争、“守死善道”的说明。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九章·桔颂》

这表面是赞美桔树,实际是以桔自比,说自己虽被放逐,而决不背离祖国。

《九歌》是经过屈原更定的楚人的祭歌,从表面看,好像与屈原的身世无关,细读强探,就会感到其中透露一种不可掩抑的更定者的情绪。例如《东君》:

青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
援北斗兮酌桂浆。

俞平伯先生解释说:

穿着云霞的衣裳,举起天上的弓箭,射倒那变幻的天狼星,然后功成身退,拿北斗的勺子大喝其酒;这何等的痛快淋漓,兴高采烈。

他说,“举长矢兮射天狼”,表明东方的太阳星用天上的弓箭来讨伐魔鬼。魔鬼很多,什么不好说,定要用这天狼。原来古代天文地理学者说天狼星属东井,正照秦地,代表秦国的呵。^⑥

由此可见,屈原的抗秦是坚决的,他渴望着抗秦的胜利。明人陈第自言读屈作,最喜《九歌》,因为《九歌》“虚以寓实”,“词藻之妙,操觚摘采者既模拟而莫之及”。当于此等处见之。

屈原的作品既是紧密地结合着他的身世的,则其中自必洋溢着作者的真实的情感,对读者自必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王逸《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王逸的话正道出屈作有所继承和它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关于屈原作品的继承和创新,袁梅同志的这本书颇有所论列。我在这里只就三个方面提出一些看法:1. 创作冲动。这里所谓创作冲动,指诗之所由作而言。卫宏《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写诗必先有真挚的情感。而人之情感,必“感于物而动”(朱熹《诗集传序》),可见写诗必是“感物吟志”,出于自然。古代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宣十五年《公羊解诂》),都出于自然。屈原继承了这个传统,其诗紧密地结合身世,所以言之真切,富有感人魅力。2. 创作方法。古代民歌多用比兴,比兴基本是形象语言。写诗不一定用形象语言,但

感人之深者,形象语言为多,所以诗家多重比兴。用比兴,可使形象显明,可使诗情蕴藉,耐人寻味,且能显示作者“感物吟志”,不得已而写诗,并非无真情实感而硬要写诗。屈原吸收了民歌用比兴这一特点,而且他的诗是浪漫主义的诗,要虚构,要写很多超现实的事物,他用比兴比较他以前的诗歌有所发展,使读者感到突出。唐人诗宗风骚,也多用比兴。胡应麟特别欣赏《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恍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他说:“唐人绝句千万,不能出此范围,亦不能入此阃域。”(语见《诗薮》)这几句就是用比兴手法写的,“兴发于此,义归于彼”。所以使读者感到很有意味。

3. 诗的体裁。在上古,文学作品就有两种:其一是诗歌,如《诗经》;其二是散文,如《书经》。这两种文学作品,虽被区分成两种文体,但未尝不可以相互通流,相互渗透。例如《诗经》是诗歌,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周南·关雎》)“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邶风·北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郑风·将仲子》)……用了一些散文句法。出于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是诸子散文中的名作,而《老子》八十一章颇有诗歌的韵味,《庄子》亦每用韵语,如:“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读堵);东西跳梁,不避高下(读虎);中于机辟,死于网罟……”(《逍遥游》)“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达生》)“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汎若不系之舟。”(《列御寇》)这种诗文相互通流、渗透的情况,发展到战国末期,被屈原继承并加以扩充,就形成了他的不朽的糅合诗文句法的浪漫主义诗篇。我们可以说这种诗篇是散文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诗是由屈原开创的。历代诗论家,常称屈原的这种诗为“骚”,因他的代表作《离骚》抒写作者忧愤的情感,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洋洋洒洒，“忽起忽伏，忽断忽续”（王邦采《离骚汇订·自序》语），独具一种风格。屈原的“骚”，对后世很有影响，就体裁而言，它不独是古代诗歌的扩展，而且是宋玉以后的“赋”的前驱。《汉书》称之为“赋”是有道理的。后人如胡应麟、刘师培等，只知赋是要铺张的，而不知“骚”也有铺张^⑦。铺张不铺张，要从比较中看：“赋”之铺张固过于“骚”，“骚”之铺张亦过于“诗三百”。从发展上看，诗、骚、赋三者是一脉相通的。所以刘勰著《文心雕龙》，其《辨骚》一篇，专论屈作，而《明诗》、《诠赋》两篇亦涉及屈作。《辨骚》中的话：“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⑧说得多么切当啊！

严羽论学诗，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⑨元稹说杜甫的诗“上薄《风》《骚》”^⑩，杜甫亦自言：“窃攀屈宋宜方驾。”^⑪可见学诗，就要读屈作，细加揣摩。我看，我上面所提屈原及其作品的特点，是值得借鉴的。

袁梅同志的书，为初学屈原作品的人提供了很好的读物，对屈原研究者来说，也是值得参考的。严复译西文，提出三个标准：信、达、雅。我看，译文只要做到信、达就可以了。苏轼说：“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话说得很好。词至于达，则“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见《答谢民师书》）。不求“雅”而实已“雅”了。袁梅同志的译文，在“信”字上很下工夫，做得也较好；在“达”字上似犹有未尽，希望能够做进一步的探索、琢磨。

注

①苏秦曾对楚王说：“今王之大臣父兄……厚赋敛诸百姓，使王见疾于民。”见《楚策》。白起也曾说楚王“不恤其政”，“谄谀用事，良臣斥疏，

百姓心离”。见《中山策》。

②见《史记·屈原列传》。

③宣元年《公羊传疏》：“古者放臣，任其所去。”《癸巳类稿·书鲁语后》：“世臣非被逐不得弃宗庙外游。”

④参考郭沫若《屈原考》，载《蒲剑集》。

⑤我认为《九章》里的作品，不尽是屈原所作。如《惜往日》云：“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显系后人口吻。

⑥见俞作《屈原作品选述》，载1953年6月15日《文汇报》，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的《楚辞研究论文集》收入。

⑦胡应麟《诗薮》说：“骚与赋体裁不同，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钜为工。”刘师培《论文杂记》说：“循名责实，惟记事析理之文可赐赋名，自战国之时，楚骚有作，词咸比兴，亦冒赋名，而赋体始淆。”

⑧博徒多取，故以言铺张。

⑨见《沧浪诗话·诗辩》。

⑩见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

⑪见《戏为六绝句》之五。

目 录

序	庄维石 1
引论	1
离骚	91
九歌	165
东皇太一	167
东君	170
云中君	176
湘君 湘夫人	179
大司命	192
少司命	197
河伯	203
山鬼	207
国殇	213
礼魂	217
九章	219
惜诵	220
涉江	235
哀郢	243
抽思	253

怀沙	265
思美人	277
惜往日	287
橘颂	298
悲回风	302
天问	319
招魂	373
附录(一)	
卜居	410
渔父	413
附录(二)	
爱国思想是屈原作品的灵魂——兼论《离骚》	416

引 论

一、“楚辞”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最初升起的灿烂明星,是第一部乐歌总集——《诗经》;踵继《诗经》而升起的又一颗明星,便是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它打破了诗坛上《诗经》以后两个世纪的沉寂而大放壮采。它不仅照耀着“楚辞时代”的诗歌发展道路,而且历两千余载仍不稍减其光辉。

(一)“楚辞”的名称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具有楚语和楚音特征的、富于地方色彩和楚地民歌传统的一种新兴文学样式。又因其中的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所以也称“骚体”。(按: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引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原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诃、蹇、纷、佗、僚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蓀、若、芷、蘅者,楚物也。”黄氏说出了“楚辞”的一些特点,可供参考。)

西汉末季,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并附加

他仿作的一篇《九叹》),以“楚辞”名之,自此,“楚辞”又成了这部诗歌集的专名。沿至东汉,王逸给“楚辞”作注,辑成《楚辞章句》一书(并增入自作《九思》一篇)。

“楚辞”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张汤传》和以后的《汉书·朱买臣传》,二者俱载朱买臣以能言“楚辞”而见宠于汉武帝;《汉书·地理志》曾称述枚乘、淮南王刘安、严助、朱买臣之属传习“楚辞”;《汉书·王褒传》也言及汉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之事。此外,“楚歌”之名,在《史记·项羽本纪》、《史记·留侯世家》、《汉书·韩延寿传》中都有记载。

“楚辞”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次大解放、大创新、大进步。它植根于楚地民歌,又高超于楚地民歌。不仅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由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而且还有一个显著标志:由原来的无主名、集体口头创作进到有主名、有个性的作家艺术创作。两千二百年前,戴上桂冠而特立于我国古代诗坛的有主名的诗人便是屈原。

我们现在研究“楚辞”,主要对象是屈原的作品,因为他是“楚辞”这种文人诗歌的创始者和代表者,只有他的作品真正体现了“楚辞”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

(二)“楚辞”的先河——“二南”、有韵铭文、楚地民歌

《诗经》有“十三国风”,又有“二南”(《周南》、《召南》)。虽然通常是将“二南”并入“国风”,习称“十五国风”,但是“二南”毕竟是一种独特的乐歌。“十三国风”,基本是黄河流域的乐歌;“二南”,基本是楚地的乐歌。除《周南·汉广》、《召南·江有汜》以汉水、大江名篇可确认为楚歌外,其他许多作品的风格也跟这两篇相近,而与“十三国风”有异。况且,“南音”、“南

风”、“南乐”之称，早已见诸《左传》成公九年、襄公十八年及《礼记·文王世子》的记载。“二南”，实即“南风”、“楚风”、“楚歌”之异称。它是汝、汉、沱、江一带（春秋以后楚国国土）的地方乐歌。“周”、“召”各为地区之名，“南”是诗体乐调之谓。“二南”大约产生在周平王东迁（即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当时，楚地在经济繁荣、物产丰富的条件下，文化艺术也非常发达，特别是在乐、舞、诗歌方面，芳华竞发。在《诗经》四体中，“二南”的创作年代较晚，但是后来者居上，其中有很多进步而新颖的佳构。它也同“十三国风”一样，是在地方民间口头歌谣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提高，又经过乐官、文学之士整理加工，录而传习的。尽管经过加工润色之后，它的地方色彩已不像“楚辞”那样浓重，但它还是保留着一些“楚语、楚声、楚地、楚物”的痕迹的。如明言“江”、“汉”、“汝”、“沱”等楚水之名；又如《周南·葛覃》、《邶斯》、《麟之趾》、《野有死麋》，《召南·摽有梅》等乐歌中运用的语词“兮”，《周南·汉广》中运用的语词“思”，都是楚语楚声；又有“睢鸠”、“黄鸟”、“蠡”、“草虫”、“鲂鱼”、“葛”、“藜”、“苕菜”、“卷耳”、“梅”、“唐棣”等楚物之名……由此可见，“二南”确实是“楚辞”的先河。

“楚辞”是在楚地乐歌“二南”的流风余韵中发展提高、日臻成熟的，它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我国古代汉文学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波峰。它不但继承并发展了“二南”的优秀传统；而且祖述并发扬了“十三国风”的优秀传统。它既是战国时期南、北文学艺术传统的合流融会，同时又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独特风格。

除“二南”收录的“楚地乐歌”而外，楚地民间歌谣有其悠久的渊源，据《吕氏春秋·音初篇》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